

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啸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琼瑶的泰坦尼克

苏 萨

为琼瑶的小说流泪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大学的女同学们常常捏着汗湿的手帕，看《失火的天堂》或者《心有千千结》而双目迷离。

萨自认并不是一个感情很粗线条的人，然而，作为一个燕赵之地的子孙，西北高天下的苍莽黄沙，边塞草原上的铁马冰河，是我心中更加亲近的。因此，于琼瑶书中的恩怨，多少觉得是“小女子心态”，和我不大相关。

想当然地认为，能写出这样作品的琼瑶，无疑是个感情世界坎坷无比又丰富无比的小资。当她在铺了天鹅绒的大床上为了爱情辗转反侧的时候，萨正在和兄弟们在风雪漫天的机场跑道上为波音 737 换轮子。我们的世界，没有交集。

直到看了她的《我的故事》。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毕业时读的。早晨开始看，直到黄昏，因为我读完之后，又反复了一遍。那一天，琼瑶的世界在我的心中天翻地覆。

《我的故事》是琼瑶的自传，我想，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不可以算做真正明白琼瑶是怎样一个人。

这部书中，记录了一段我们早已忘记的历史，也颠覆了我对琼瑶的看法。

琼瑶的确出生于教授之家，书香门第。然而，她记录下的童年，却和小资没有多少关系，她用了大量的篇幅记录的是——逃难。

1944年，六岁的琼瑶，随着全家——祖父、父亲和母亲、哥哥、弟弟……开始了逃难的历程。那一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琼瑶家的祖屋所在地衡阳，是两军决战之地。中国军队第十军在这座城市死守了47天，终因援军不济，力竭城破。

逃难之前，琼瑶把自己最珍爱的一面小锦旗交给了妈妈，藏在寄宿农家的阁楼里，因为大家都说农家一无所有，日本人是不会抢劫这个地方的。

日军果然没有抢劫，他们烧掉了整个村子。这只是琼瑶记忆中苦难的开始。

逃亡中，琼瑶第一次目睹了死亡。“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掩护着我们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啸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

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接着，他又被日军围住搜查，一切财产都被抢去，连琼瑶的母亲都险些被日军掳去。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放手！你这禽兽！放手！”一切发生得很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枪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拐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和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只是因为琼瑶的弟弟恰好和带队日本军官的孩子同岁，拨动了他的侧隐之心，一家人才逃过此难。

弱国子民的血泪，尽在于此。

写下这样文字的，是我们所认为自己熟悉的琼瑶吗？

读这部书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点淡淡的疑问——有着这样经历的琼瑶，成年后的作品中为何却只有温柔婉约，而没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刚强之气呢？

直到看了《泰坦尼克》中的一段，我忽然若有所思。

《泰坦尼克》的结尾，罗丝是怎样对杰克喃喃自语的呢？

她没有说我是多么的怀念你，在心底爱你这些话。她说：我结了几次婚，爱过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走了世界多少个地方……杰克的死，是为了罗丝的生。

她是那样珍爱杰克换来的生命，所以让自己的一生都快快乐乐，轰轰烈烈，一直到90岁。

她的生命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快乐了，他才快乐。

对于琼瑶来说，排侧温婉是她的本性。历尽劫难，痴心终而不改。这种南方小女子的情怀，在《我的故事》的苦难衬托下，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离原上草，用最柔弱的一面让人感到生命的顽强与灿烂。

摘自《大众文摘》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多贵的手表也是给人戴的，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物，即便只是戴块极普通的手表，其附加值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世间“金劳”千千万，但怎比得了这两块与伟人有缘的“无价之宝”。

领袖“劳力士”背后的故事

劳力士手表在瑞士并不算上顶级名牌，它一直走的是一条中间偏上的中高端路线。贵而不奢，矜持中带有阳刚之气是它的主流风格。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当年瑞士和阿拉伯国家外宾造访中国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个品牌的手表作为馈赠之礼，分别送给当时中国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从照片上看，瑞士人送给毛泽东的这块劳力士非同寻常，显然出自定制，因为手表上日历盘所显示的竟然是想当年的阿拉伯数字，而是汉字，仅凭这一看似细微的差别，就足见瑞士人的用心良苦。此外，这块表的制式和纯金质地在这里并不显得过于突出，劳力士毕竟也算是见过大世人的手表品牌，戴过它的名人巨富何止数以万计。但能在劳力士表厂下订单定制手表的人恐怕为数不多。可

以断定，市面上带汉字的金劳力士不是天下绝版，至少也是凤毛麟角。

毛泽东当年打天下是有名的“三不戴”，即一不戴枪，二不戴钱，三不戴手表，至少1945年以前关于毛泽东用什么样的手表一事没有任何记载。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郭沫若在机场看到毛泽东手腕上没有戴表，当即将自己手上的欧米加手表赠予毛泽东。毛泽东欣然接受，从此以后就一直戴着这块表盘上的字已有些脱落的瑞士名表，只是在1966年8月换过一次表带。

毛泽东的手表稀罕，毛泽东看手表的照片更为罕见，这迄今发表的有关1959年9月30日由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拍的那一张，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孤作”了。

据杜修贤回忆，当天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将要飞抵首都机场，应邀参加

中国建国10周年庆典，毛泽东周恩来亲到机场迎接。杜修贤那天晚到了一小会儿，看到飞机还没有到，觉得无趣可拍，正好碰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相互伸出腕子对手表的一瞬间。杜修贤咔嚓一声，将这一历史时刻摄入镜头。因为这张照片上还有郭小平，所以光凭人物而言，此照片的“信息含量”就已弥足珍贵，再加上难得一见的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看自己手表的情节，尽管画面不太清晰，其史料价值也是重金难买。当时毛主席手腕上的那块手表想必就是1945年郭沫若送他的那块，周恩来的手表则很可能是一块国产的上海牌手表。

我曾在某老革命家回忆文章上看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央最高领导人为了给即将出国“执行任务”的志愿军领导人以及驻外大使壮行，特批每人发给一块瑞士手表(据说有劳力

士也有欧米加)和派克钢笔作为随身之物。当时还有一番争论，是全发，还是只发手表不发钢笔或只发钢笔不发表。记不清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说了一句：全发，别搞得小家子气，让人家看不起咱们。

当时的这两件奢侈品是专门从香港买来的，周恩来当时兼任外交部长，故也在发表之列，据说是一块劳力士。1958年，上海手表厂造出了自己的上海牌手表，周恩来自打那时候就改戴国产表了。1961年庐山会议时，周恩来在南昌看魔术师表演，曾把自己的手表借给魔术师当道具，之后送给了魔术师，至于他的劳力士还是上海牌不得而知。只晓得周恩来去世时手上戴的还是一块很旧的上海牌手表，这块表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抢救”下来，自然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

说来说去，多贵的手表也是给人戴的，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物，即便只是戴块极普通的手表，其附加值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世间“金劳”千千万，但怎比得了这两块与伟人有缘的“无价之宝”。

摘自《财经·视觉》

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百出了，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捡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东星北谈话，东星北说：“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

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摘自《课外阅读》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人们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这些事件，其中就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丘吉尔的两次选择

边。”詹妮义无反顾地披上了婚纱。但这桩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

十多年过去了，詹妮的儿子已经凭借卓越的才能跻身政坛。60岁的詹妮又要再次迎来婚礼。这次的决定同样遭到众人的反对，尤其是儿子的那些反对派们。

詹妮犹豫了。这与上次不同，儿子打小就怀有雄心壮志，并且具备实行远大理想的能力。她不想因为自己耽误了儿子的前程。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儿子又一次握住了她的手：“如果让我在我的仕途与您的幸福之间做选择，我心甘情愿地选

择后者。”

这一次，新郎比儿子还年轻。能够两次接受母亲的婚姻，也许很多人都做得到。而面对沉重的压力，两次接受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继父，这需要多么豁达的胸怀。这个体谅母亲、爱护母亲的儿子就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摘自《家庭生活》

财富断想

葛剑雄

大概是前35年深受无钱之苦的缘故，我一直以为与节流相比，开源是更重要的。所以只要有利于开源，必要的投入应毫不犹豫，冒些风险也值得。

1986年秋我从安徽乘火车回上海。按规定，副教授只能报销硬座车票，上车后，我自费补了十来元的差价，坐进了软席车厢。同行者不理解，觉得硬席车也有座，何必多花这钱？我有自己的算法：那时的软席车很空，完全可以占着一张小桌，我随身带着待标点的古籍复印件，每千字的稿费约3元。车到上海，我已点完五六千字，所得远超过所付，而且能及时完成，何乐而不为？所以，只要发现有有利于改善工作条件的设备，我总是尽早购买。1986年夏天买摄影机；1987年在房间里装窗式空调；1990年买台式电脑；1991年买笔记本电脑；1992年买手提摄影机；1997年买数码相机；1998年买第二台笔记本电脑和掌上摄影机；2000年买第二架数码相机、第一个数码录音机；2001年买第三台笔记本电脑；百

分之百自费。钱花了不少，但除了摄影机只供个人收集资料外，其他设备都产生了很大的效益。这些新、轻、精的设备，随着我走遍七大洲，无论在飞机、火车、轮船，旅途、旅馆、会场、野外、家居，我都能随时运用。像今年在非洲期间，几乎每天在路上，但我用笔记本电脑写的文章，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都能及时发回国内，在网路和媒体发表。我的第二架数码相机是专为南极之行买的，用它拍摄的南极照片广泛发表于报纸杂志和画册，也用于我自己的书中。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比一味节流效益要高得多。

在财力允许的范围

内，应该适度并且积极地消费。钱存在银行，留在家中，或一味追求保值，至多只能产生精神上的满足，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既改善物质生活，也满足精神需求，还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于公于私都有利。

青春可买

一个20多岁的姑娘嫁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这老人先前已有过两个太太，11个孩子。这会儿媳却让姑娘坚信：他爱她。

过了不几年他死了，留下巨额遗产，却没留下清楚遗嘱。她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不屈不挠地与那一家子人打官司。

这起遗产官司太棘手了，一打打了10多年，将她从一个如花少妇打成一个皱纹丛生的中年妇人，还不见一点眉目。但她毫无懈怠之意，

她愿一直打下去，为了维护自己与孩子的合法权益。要是再打上10多年，她要把自己打成一个老孀了。到那时，巨额遗产还到了手怎么办？巨额遗产到手了又怎么样？

哲人们曾朗朗地说：金钱买得了这，买不了那，却买不到青春。

未曾想到连青春都可以买到。老耄老人临死的那一霎，与人间达成最后一笔交易，重金买走了妻子的青春。

摘自《经典美文》

名流故事

李肇星一次免费看电影

日前，原外交部长李肇星致函黑龙江日报，谈起了他看电影的一段亲身经历：

春节前，我在祖国最南的省份海南三亚看了电影《长江7号》，觉得很有意思。我的心却飞到了祖国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的哈尔滨。我看的上一场电影是由两位哈尔滨朋友免费提供的，我想感谢他们，却至今不知他们的姓名。

那大约是在2006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晚饭后，老伴和孩子提议出去看一下张艺谋新导的古装片。我那时工作较忙，连晚饭也不常在家吃，饭后陪家里人看电影更是奢想。

记得我在美国工作六

年期间共看过六部电影，能记住片名和故事梗概的只有《一个都不能少》和《秋菊打官司》，都是张艺谋导的，印象挺好。这次便爽快地同意去一趟北京的电影院。等我们走到售票窗口，发现票已售完，周围的人大多是在等退票。我有些失望，正拉着老伴准备离去时，旁边一位高个子的中年男子问我，“你是李外长吗？”我答，“我是李肇星。请问您从哪儿来？”他拉着老伴笑了，用东北口音大声地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我们打哈尔

滨来，到北京出差。”他似乎注意到我老伴还在盯着电影院，猜出了几分，便热情地问道：“您二位是来看电影吗？没票了吧？我们这儿正好有两张今晚的票，我们有事，看不啦，给您吧！”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有事，而当时一票难求，我们不能不有所受。我真诚地婉言谢绝哈尔滨朋友的好意。

对方却比我更执着。他说：“我们是有事看不啦，何况您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们真的很喜欢您，能给您三张票是我们的荣幸！”说着，硬是把票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跑了。

我拿着票，已在夜色中找不到他们的身影。我这才想起还没有给人家票钱，也没问人家姓名。

那晚上的电影好像不如我上面提到的那两部好看，但我却永远记住了那两位热心的哈尔滨人。去年出差路过哈尔滨时，我向黑龙江省领导谈及此事，他们自豪地说：“没什么，有首流行歌曲唱得好，东北人多是活雷锋！”

摘自《黑龙江日报》

公安没有特权

学习解放军。1958年8月，全国公安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修改的《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并规定每年年终或春节期间的一个月作为公安人员的爱民月，公安机关要征求群众的批评意见，要检查一年的守纪情况。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走到楼梯口，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可以，可以。”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关于禁止公安工作人员看白戏或利用职权随便出入文化娱乐场所的规定》号文件。

为了搞好警民关系，罗瑞卿提出，人民警察要

分之二。

对于取得的成就，罗瑞卿并不满足，他总是要求把工作做得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有一次，他到一个城市了解治安情况，汇报的人得意地说：“只发生了工人丢掉自行车的小刑事案件，还发生过汽车撞伤孩子的小事故，有几次火灾，都及时扑灭了。”罗瑞卿立即批评说：“一个工人用几年的积蓄买了辆自行车，被人偷了，这算小事吗？小孩撞伤也许会终身残疾。一座油库、一座厂房，由于粗心大意，扔了一个烟头而被烧掉了，这也是小事吗？”

在罗瑞卿的严格要求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从未有的良好治安秩序和社会风气。

1959年9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兼总参谋长。他在公安部欢送大会上说，像公安部门这样的权力机关、专政机关，一定要有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三是国家法律的监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

摘自《罗瑞卿传》